

译者的主体性在文学翻译中的作用

宋 扬

(湘潭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南 湘潭 410125)

摘 要: 文学翻译中译者的主体性, 主要体现在对原作思想内容和风格特色的把握和再现两个方面, 其发挥直接影响着译文的质量。从译者的主观感受、语言风格、意识形态、个性和主观审美偏好、文学文化修养等角度, 研究了译者的主体性在文学翻译中的各种影响来说明译者主体性能否得到充分发挥, 对于翻译之成败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关键词: 译者; 主体性; 文学翻译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 4074(2006)04- 0157- 04

作者简介: 宋 扬(1982-), 女, 湖南张家界人, 湘潭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译者主体性是文学翻译中客观存在的。解构主义翻译思想的经典文献瓦·本雅明的《翻译者的任务》中指出: “在译文中, 原作的生命获得了最新的、继续更新的和最完整的展开。”解构主义翻译思想的积极倡导者劳伦斯·韦努蒂提出“原作者的不可见性”, 即原作的隐身。我国翻译理论界对译者主体性的关注始于 20 世纪 30 年代对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的讨论, 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 中外翻译理论界对文学翻译中译者主体性的探讨表现出强烈的理论自觉性。近年来国内翻译界对翻译主体与翻译主体性的研究越来越重视。人们对十几个不同译本的《红与黑》和几个不同版本的《茶花女》进行分析和研究发现, 有些译者在翻译中注意理顺了原作句与句之间的关系, 明确揭示出了其中隐含的信息, 甚至在译文中完全改变了句法; 而另一些译者却局限于原作的字面含义和句式结构, 在译文中尽可能保持原作的语言特色和风格。这些基于同一原作的不同译本折射出不同翻译方法与不同的“忠实”。有的更忠实于原作语言的形式和风格, 有的更忠实于原作语言的交际功能, 有的更忠实于译作跟原作意义的对等。一旦撇开译者所受到的局限性及译文功能性的限制这些客观因素, 译者在整个翻

译过程中的主体作用得到凸现。

一、译者的主观感受对译文的作用

“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根据这句接受美学的名言, 我们可以顺理成章地得出这样的判断, “有一千个译者同样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因为, 众所周知, 译者首先是原作的读者, 他(她)对原作的理解必然带有自己的主观性, 他(她)对原作的翻译处理也会不可避免地打上其主体性作用的烙印。以下是我国翻译界几位名家对莎士比亚戏剧《王子复仇记》中哈姆雷特的一句著名台词的不同翻译。

(一) To be or not to be—that is a question.

1. 活下去还是不活, 这是问题。(卞之琳译)
2. 生或死, 这就是问题所在。(王佐良译)
3. 死还是不死, 这是个问题。(许渊冲译)

我们从三位名家对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中名句的翻译中可以看出译者的主观感受对译文的影响。如果读者置身

* 收稿日期: 2006- 04- 15

处地,自己就是哈姆雷特,会不会问自己“活下去还是不活”呢?如果想活下去,那就不会这样问了;如果不想活下去,或是有问题,那就会问“死还是不死?”;而第二种王佐良先生的译文“生或死”,听起来像是哲学家在讲台上讨论生死问题,不像是剧中人在舞台上吐露真情,与原文风格大不相同。因此,第三种许渊冲先生的翻译是比较切合这段话当时的语境的。

(二)我们再来看看崔护的《题都城南庄》:“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里列举了 Giles 与 Wang Shouyi & John Knoepfle 的两种不同的翻译。

译文一:

A retrospect

On this day last year

what a party were we!

Pink cheeks and pink

peach- blossoms smiled upon me;

But alas the pink cheeks are now far far away,

Though the peach- blossoms smile

as that smiled on that day.

——Giles

译文二:

Poem written for the South Village of Jun Town

Last year on this morning

I walked through the village

In one courtyard.

I saw the face of a woman

And the peach blossoms,

A pale red reflecting pale red,

Now I see the courtyard empty,

The woman no longer there.

Only the peach blossoms

Tremble on the wind...

——Wang Shouyi & John Knoepfle

对照这两个译本,我们就可以发现两位译者对诗的主观感受存在着很大的差异。Giles 从原诗中感受到的是诗人旧地重游,抚今追昔。忆起“去年今日”跟“人面”邂逅时的两情相悦,故而在译诗中重复使用了四个“smile”。他先用两个“smiled”来翻译处理“人面桃花相映红”一句,以拟人的手法描述“粉红的桃花”(pink peach blossoms)和“粉红的人面”(pink cheeks)一同“冲我微笑”(smiled upon me),然后又用了两个“smile”来译第四句“桃花依旧笑春风”(…the peach- blossoms smile as that on that day)显然, Giles 不自觉地将自己的主观感受带入了他的译诗当中,所用四个“smile”过多地点染了“微笑”带来的喜悦气氛,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桃花依旧,人面不再”,原作诗人“触景伤情”的意味,不懂原诗写作背景的译诗读者恐怕难以从译诗中感受原诗的淡淡哀伤。而 Wang Shouyi & John Knoepfle 两位译者则过分地感受

了原诗“哀伤”之情,并把这种主观感受移入译诗之中。在他们的译笔下,“人面桃花相映红”被转换成了“the face of a woman and the peach blossoms, a pale red reflecting pale red”,而“桃花依旧笑春风”经他们的移情处理,变成了“Only the peach blossoms tremble on the wind...”。译诗中的“pale”和“tremble”两个词明确地昭示着译者着意要将诗人的惆怅悲戚与落寞情怀传达给读者,他们不惜改变原诗的用词与语言结构。遗憾的是,他们没能准确地把握原诗“桃花依旧笑春风”一句以“乐景”写“哀情”倍增其哀之特点,因此,翻译处理得有点过犹不及。

二、译者的语言风格对译文的作用

一般说来,诗词翻译最能体现出译者的主体性,虽然诗词翻译中译者在透彻理解原文过程时限制非常多,但要想在翻译过程尽量再现原诗,并充分体现自己的语言风格,译者必须突破这些限制,在译入语中寻求适当的语言和表达方式,才能在理解的基础上实现视界的融合。下面就是两个诗词翻译的例子,说明译者的语言风格对译文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一)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那首流传很广的关于生命、爱情和自由的诗,其匈牙利原文如下: Szabadsag, Szerelm! Eketto kell meke m, Szerel me mert folaldozom az eletet, Szabadsagert folaldozom szerel me met.

译文一:

自由,爱情,

我的全部憧憬!

作为爱情的代价,我不惜付出生命,

但为了自由呵,我甘愿付出爱情。

译文二:

生命诚可贵,

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

两者皆可抛。

——白莽

比较这两个译文,我们可以发现译文一采取的是异化的翻译原则,更加地忠实于原作;而译文二则是典型的归化,译者白莽的译诗和裴多菲的原诗是有一定出入的,至少我们从语言上看,原诗层层递进,用的是一种修辞格上的铺垫,加强了憧憬自由的力度:爱情高于生命,而自由更高于爱情;层次十分清晰(许渊冲,2000:149)。而白莽的译诗在语法修辞上做了调整,琅琅上口,又不失原意;译成中国人习惯的五言诗,因此得以在中国读者中间广为流传,并享有很高的声誉。译文二充分体现了译者的语言风格,也是译者主体性发挥的成功例子。

(二)在英汉、汉英翻译过程中,诗词是诗人自然情感、个人风格、语言特色和文化时代背景等的和谐统一体,译者在这些方面都与之相距甚远。译者欲成功地将一首诗词进行英译或汉译,必须充分发挥其主体性,融入到原诗中去。

反之,若不考虑上述因素只进行文字转换,必然会得到诗不像诗的译文。下面参照的是一段中文诗词“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两个不同译本。

译文一:

I look for what I miss.

I know not what it is.

I feel so sad and drear.

So lonely, without cheer.

译文二:

Search, Search, Seek, Seek

Cold, Cold, Clear, Clear.

Sorrow, Sorrow, Pain, Pain.

这两首英译文,第一首是翻译名家许渊冲先生的译作;第二首则由一位外国汉学家翻译。它们都传达出了原词作者所寄予词中的孤单的情感和营造出的冷清、凄凉的氛围;但在形式和风格上完全不同,在结构和措辞上又都独具特色,都可谓是成功的译作。

三、译者的意识形态对译文的作用

我国近代著名的翻译家林纾自幼具有爱国思想,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他“感愤郁勃,无可自适”,翌年中国战败,《马关条约》签订,这对他刺激甚大,在极度悲愤中,他与陈衍、高凤岐等人联合上书清廷,反对割让辽南及台湾、澎湖列岛。戊戌变法前夕,林纾也经常与友人议论新政,探求自强之策。在北京,还与著名维新派人士林旭会见,又与高凤岐等三往御史台,上书评论时局,陈述变法策略,因顽固派阻挠,未能上达,但其爱国热情始终未衰,一如既往。因此他的翻译中始终贯穿着爱国主义这条红线。《黑奴吁天录》是林纾翻译的代表作,《黑奴吁天录》之所以在中国引起震动,主要因为深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的中国人民的命运、处境和小说所描写的“黑奴”有着相似的情况。1901年正是帝国主义列强加紧瓜分中国、民族危机日趋严重之际,割地赔款,划分势力范围,筑路开矿,更加深了中国的殖民地化程度,亡国灭种之祸迫在眉睫。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稍有警觉的中国人,读了《黑奴吁天录》都感到悲愤和痛心,激起他们的反帝爱国热情。林纾译这部小说的目的,就是为了“振作士气,爱国保种之一助”,同时也是为警告国人:“其中累述黑奴惨状,非巧于叙悲,亦就其原书所著录者,触黄种之将亡,因而愈生其悲怀耳。方今嚣讼者已胶固不可喻譬;而倾心彼族者,又误信西人宽待其藩属,跃跃然欲趋而附之。则吾书之足以儆醒之者,宁云少哉!”(林纾,1960:197)

以第一本德语版的《安妮日记》的翻译为例,也可以看出译者的意识形态对译文的操控。《安妮日记》揭露了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迫害。译者安内莉茨·许茨(Anneliese Schutz)将书中与当时德国意识形态相冲突的词语进行了弱化处理或采用了中性化翻译,有时甚至删节不译。例如:1. er bestaat geen groter vijandschap op de wereld dan tussen Duitsers en Joden (There is no greater enmity in the world than between

Germans and Jews.) 2. Eine grissere Feindschaft als zwischen diesen Deutschen und den Juden gibt es nicht auf der Welt. (There is no greater enmity in the world than between these Germans and the Jews.) 对比这两个例句,我们发现译者在翻译的时候将原作中的“德国人同犹太人”改为了“那些德国人同犹太人”对此,译者是这样解释的:“一本书要在德国有良好的销路……就不能含有针对德国的侮辱性词语。”(转引自Lefevere, 1992: 66)由此可见,意识形态对作品在译入语系统中的认可与接受具有不可否认的制约作用。

四、译者的个性及主观审美偏好对译文的作用

巴金在译介外国文学上体现出鲜明的主体性:他将翻译提到与创作同等重要的地位,只翻译自己喜欢的,能在心灵上引起共鸣的作品,以实现“把别人的作品变成我的武器”的目的。他高度重视翻译工作的创造性,除了注意保持原作的情调、韵味外,还力图体现他自己的风格,而后者正是广大读者深深喜爱巴金译作的一个重要原因。他在《巴金译文选集》序中就明确告诉读者,虽然他的译文“达不到原著的高度和深度”,但他“只希望把别人的作品变成我的武器”。这清楚地说明巴金译介外国文学并非单纯出于个人的兴趣、爱好,而是有着鲜明的社会功利目的,这也正继承和发扬了新文学译介外国文学的优良传统。

有人曾分别请数学家、物理学家和文学家翻译“代表团由各行各业的人组成”这句话,结果得到了以下三个不同的译句。

1. People from numerous fields form the delegation.
2. The delegation is composed of people from a spectrum of professions.
3. People from a variety of professions to gather to be this delegation.

由数学家翻译的第一句中我们可以注意到在数学领域应用的非常广泛的“numerous”(许多的)与“form”(形式);在物理学家翻译的第二句中用的是“is composed of”(由……组成)和“spectrum”(光谱);文学家翻译的第三句中用上了“a variety of”(丰富多彩的)和“gather”(采集、收割)。我们必须得承认,这三句译文都忠实地再现了原句的含义,三位译者都恰到好处地发挥了各自的主观能动性,体现了各自的专业个性。由此可以看出,如果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恰到好处地揉进自己的个性,这样做非但不会损害原著,相反可能还会使原著在译文中更显魅力。

五、译者的文学文化修养对译文的作用

艺术表现力的高低有天赋的成分,但更多的是依赖后天的培养。一个优秀的译者首先得熟悉各种艺术文体,了解它们各自的表现方式,能从事各种文体的写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把优美的诗歌译成枯燥乏味的散文。如果译

者永远只会用自己熟悉的那种笔调、风格进行翻译,这无异于对艺术的“犯罪”,因为他抹杀了不同作者作品的艺术个性。其次,译者还得相应地调整译文的风格。在同一部作品中,不同的场合会有不同的语言表述,不同的人物会有不同的语言习惯。译者必须捕捉到这些变异,并用自己的语言把这些变异恰如其分地表述出来。

(一) 翻译说到底就是一个理解和传达的问题。一个译者的中、英文修养是深透理解和正确传达原作思想内容的基础,因此,译者必须得拥有丰富的词汇和语法知识,有较强的双语表达能力。李丽娟在翻译奥切的《深红色的海绿》中的一段:“She had ordered her coach to drive her to the ‘Crown’ inn; once there, she told her coachman to give the horses food and rest. Then she ordered a chair, and had herself carried to the house in Pall Mall where Sir Andrew Foulkes lived.”在初译时将‘chair’译为“轿子”,后来经过反复斟酌将译文改成“马车”,又再三推敲译成“单马轻便马车”,这样既与前句中的“coach”(四轮大马车)形成对照,又能与女主人公当时急切的心情相呼应。

所以,除了深厚的语言文字功底之外,一个成功的译者应该对语言背后承载的文化有个基本的认识。某些词汇的含义会带有某一国度的思维习惯和感情色彩,这些色彩是别国语言中的对等词汇难以反映与体现的,但它们给接受者的心理感应却是非常强烈的。一个精通汉语诗词的人一看到“杨柳”一词,自然会产生一种离情别绪,并由此生发开来展开丰富的联想。然而,一个美国人,即使是一个美国汉学家对“willow”一词可能也难以产生同样的感悟。同样,一个不了解外国风俗习惯的中国人怎么也不会理解“骄傲”和“狗”竟有褒义色彩。由此看来,一个译者的语言文学素养不仅在于他拥有多少词汇,而且在于他理解这些词汇的程度。

(二) 作为一种再创造,文学翻译自然不可能脱离译者的主观性而进行。在翻译中,译者不仅仅是原作的仆人,他

在语言转换的过程中有自己的创造空间。面对原作,译者有双重的任务,这就是尽可能透彻地理解原作,并将原作所蕴藏的各种价值成功地表现在译文中表现出来。

下面是孟浩然的五言绝句《宿建德江》(A night-mooring on the Jiande River):

移舟泊烟渚, While my little boat moves on its mooring of mist,

日暮客愁新。And daylight wanes, old memories begin ...

野旷天低树, How wide the world was, how close the trees to heaven,

江清月近人。And how clear in the water the nearness of the moon!

——Bynner

译者用了一个“begin”来表示“新”,谁能说这不是译者在深刻理解原诗的基础上对原诗意蕴独具匠心的传达呢?谁又能说这不是译者的再创作呢?因此,只有将译者从原作中捕捉到的思想感情和风格神韵等运用另一种语言独具匠心地表现出来的译作才能和原作具有同样的艺术魅力。

尽管至今人们对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作用仍然是众说纷纭,但译者与原作者一样都处于历史当中,具有历史性。他的翻译必然与机器翻译不同,会在整个过程中体现出他的主体性。不管这种主体性对译文读者的形象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它都是不可避免地客观存在着。我们强调译者的主体性,并不是说译者可以不顾原文的存在而擅自借题发挥,一味地去表达自己的观点、看法和审美意识;而是指译者应当自觉充分地了解自身在翻译实践中的主体性,正确把握、理解原文所表达的思想内容,然后把它恰到好处地用另一文字再现出来。

(责任编辑:粟世来)

The Role of Subjectiveness of the Translator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SONG Yang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Hunan 410125, China)

Abstract: Subjectiveness of the translator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wo aspects: grasping and recreating the content and style of the original text, which influences the quality of the translated texts directl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translator's subjective feeling, language style, ideology, personality and aesthetic taste, this paper illustrates that the fulfillment of the translator's subjectiveness is vital to a successful literary translation.

Key words: translator; subjectiveness; literal translation